



刘淑青 著

英国革命前的政治文化

17世纪初英国议会斗争的别样解读

POLITICAL CULTURE
BEFORE THE CIVIL WAR IN
ENGLAND



人民出版社

英国革命前的政治文化

17世纪初英国议会斗争的别样解读

POLITICAL CULTURE BEFORE THE
CIVIL WAR IN ENGLAND

刘淑青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陆丽云
封面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革命前的政治文化:17 世纪初英国议会斗争的别样解读/刘淑青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01-015265-3

I. ①英… II. ①刘… III. ①政治文化—研究—英国—近代 IV. ①D75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5879 号

英国革命前的政治文化

YINGGUO GEMING QIAN DE ZHENGZHI WENHUA
——17 世纪初英国议会斗争的别样解读

刘淑青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330 千字

ISBN 978-7-01-015265-3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2015年5月，刘淑青教授来访，言其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已近尾声，且与人民出版社签订合同，书稿《英国革命前的政治文化：17世纪初英国议会斗争的别样解读》将于近期出版。淑青教授获教育部社科基金立项我早有耳闻，却不知研究进展如此顺利，研究成果即将出版。她希望我能够为她的新著作序，虽然我的研究领域是西欧中世纪史，而她的书稿是研究英国近代问题，但是盛情难却，我接受了为其新作作序的邀请。

审视书稿的题目，我的第一感受是作者本人对选题的欣赏和驾驭选题的自信。

诚如作者所言，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一个经典话题，内战的硝烟尚未散尽，英国社会各界对战争的讨论即已展开，迄今已近400年之久。可以说，每个时代都有史家倾注了自己的思考和研究，由此形成了一门著述浩繁、包罗广博的显学，可称之为英国革命史学。在我的印象里，经过历代学者的反复挖掘，英国革命史学已经几乎透支了它的学术资源和研究价值。这并非说这门学问再没有研究的必要，就人文学科而言，任何课题的研究都没有止境，但选题和研究过程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国内史学界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如果从清末立宪时算起，也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据笔者所知，已有林举岱先生的《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刘祚昌先生的《英国资产阶级

革命史》（新知识出版社 1956 年版）两部专著。世界通史、世界近代史的专著与教材也无不予以重点论述。而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虽有政治运动干扰，无学术专著出版，却有大量论文问世。这些论文无不就英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在英国本土，从以克拉伦敦伯爵为首的保王党史学、以休谟为首的托利派史学，到以马考莱和伽狄纳为首的辉格派史学，从 20 世纪的社会经济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正统派史学，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修正派史学，英国革命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无论史学家秉持怎样的历史观、方法论，固守怎样的历史思维和政治立场，研究成果如何不尽人意或存在缺陷，他们在史料检索、整理、解读、著述、体系建构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正因为如此，这门学问才形成了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学术史。显然，英国革命史学具有起步早、起点高、研究深入和著述浩繁的特点，这些特点无疑增加了选题的难度。但事实是这并没有影响作者的学术信念，而且以新的视角挑战、克服了这一难度，并通过题目的关键概念以及相应的措词表露出驾驭选题的底气和自信。

面对书稿的题目，我的第二个反应是可以将这个题目写成一篇学术论文，因为题目揭示的核心是关于政治文化与政治危机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但事实却是作者以一本书的容量组织、铺陈了相关内容。当然，成果采取何种形式最终取决于作者的意志，你可以将一篇文章写成一部专著，也可以将一部专著写成一篇论文。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有一个底线，这就是基本的文理。如果不讲文理而乱加堆砌，或任意采摘，结果既无法形成前者，也无法形成后者，也就必然意味着研究的失败。按我的反应，作者显然是将一篇文章写成了一本专著。这说明了什么？答案很清楚：作者已经握有翔实资料，而且善于解读与分析史料。翔实的资料和善于解读分析的结果，必然延长著述的篇幅，而将一个小题做成一本丰满的大书。那么，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正如博士生撰写学位论文，一个题目，我们有时会担心能否写成一篇博士论文。但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存在差异，同一个题目，有的博士生不仅能够写成博士论文，而且写得很厚重，有的博士生则不能。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通常肯定前者，认为作者

“有想法”。对淑青教授而言，博士论文的撰写早已成为历史，但道理并无不同，所以可否将上述现象理解为青年学者更上层楼、臻于成熟的表现，可否看作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健康现象，这一点可与读者朋友展开讨论。作者已出版过学术专著并发表了多篇具有一定影响的 CSSCI 论文，以及将她的选题与英国革命过程做了切割从而将最易出彩的体裁毫不足惜地拒之于书稿之外，更让我对上述认识充满了信心。经过这样的处理，作者就可以在自己圈定的领地内信马由缰，畅游思想，而产生的成果也就不仅具有新意，而且富于内蕴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作者获得了上述自信？展读书稿可见，作者对英国革命史的学术史做了细致的梳理，对主要文献资料已有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掌握。就国内著述而言，林举岱和刘祚昌先生的著述当然是史学名著，但它们毕竟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作品，由于出版已久，难以反映英国革命史研究的现状。重要的是无论这些专著还是众多的通史性著述，虽不否认有些内容与革命前的政治文化相关，但都不是专门研究政治文化或从政治文化的视角研究英国革命。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发表的学术论文，也鲜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案例。在国外，特别是英国学术界，虽有相关著述出版，但这不妨碍作者进行自己的研究。英国学者固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却也存在“身在庐山而不识庐山”的局限。但作者不同，她是革命的旁观者和审视者，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范围进行观察，这对某些问题的分析可能更加客观，更合历史实际。重要的是，基于不同的知识、理论和文化背景，作者可将相关内容纳入比较的视野，提出西方学者不能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对相关事项作出不同的解读和认识。这样看来，作者对选题的自信和驾驭选题的底气也就具有了必然性，而选题本身亦给人以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感受。也正因为如此，在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的教育部社科基金评审中，作者的选题顺利胜出，获得了批准立项。

更重要的是，这一题目要求作者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功力，而且掌握一定的分析工具。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要求，作者精研了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引进和运用了“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的理论。翻检书稿可见,这一理论统领、贯穿了整个书稿的五大章内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资产阶级的公共空间,体现和寄托着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市民可以个体身份置身其中评论公共事务,以对抗和制衡公共权力。公共领域的理论基石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的批判性力量,同时又具有政治合法性基础。而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和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早期,英国资产阶级已经充分壮大和独立,英国社会也出现了 public 一词,并相应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在议会之外,咖啡馆、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等已经成为谈论时政、裁量人物的理想场所,口头信息、传抄信息与相关议会印刷品交互作用,加之听众政治意识、参与意识积极、强烈,使政治文化与议会的日常活动错综交织,对政治事务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这样看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概念与英国革命前政治文化的选题具有很高的契合度。而对英国革命前公共领域的解析,也就成为理解英国 17 世纪宗教激进派、政治激进派行为方式的关键。如果一个社会不够稳定,政府不够清明,这个公共领域很可能引发政治危机乃至社会的全面危机。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书稿的选题可谓精准地把握了当时英国社会的脉搏,抓住了内战爆发的要害。可以说,公共领域理论与英国革命前政治文化的契合,为作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构成了作者自信与底气的重要来源。

在学术史上,哈贝马斯并非最早提出“公共领域”概念的哲学家。在他之前,德国学者熊彼特和布伦奈尔就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美国学者杜威、美籍德裔犹太学者阿伦特(称公共领域为 public domain)也曾从公共哲学的角度探讨过相关问题。在这些讨论中,概念的指涉虽与哈贝马斯不尽相同,研究的侧重亦有区别,但基本的理路是一致的。因此,哈贝马斯的理论可以视为公共领域学术谱系中发展和成熟的表现。随着概念本身的研究的深入,随着作为一种理论抑或方法的付诸学术实践,公共领域不断得到改进和升华。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借用的公共领域又是一种成熟的理论,分析工具的成熟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课题研究的进行和学术目标的实现。

另外,对公共领域的借用也反映了作者从事学术研究的识见。在国内

学术界，世界史学者数以千计，专门研究政治制度史的学者亦不在少数，而自1999年哈贝马斯的著作译为中文至今，已经过去近二十年，翻阅国内的世界史著述可知，借用这一概念研究政治制度的学者仍然屈指可数。中国传统史学素重研究领域的精纯，这有助于研究的深入，但也可能导致学术视野的窄狭，影响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和国外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引进。所以在今天，即使经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外理论方法来者不拒生吞活剥之后，史学研究领域仍嫌局促。而一味沿用旧的范式而不思借用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墨守成规以致陈陈相因，必然影响研究的质量和效率，以致阻碍学术的进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领域”的借用反映了作者对人文学科而不惟历史学研究动态的熟稔，更反映了作者宽阔的眼界和识见。

但在笔者看来，同样是概念的借用，“绝对主义”似乎就没有公共领域那样契合与确切。作者遵从学术界的通行用法，将英国近代早期的君主制度称为绝对主义。刘北城先生曾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了绝对主义的概念问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将由欧洲封建时代的等级君主制发展来的近代早期的君主制度称为 *die absolute monarchie*（英文为 *absolute monarchy*），直译为中文即“绝对君主制”。而由于欧洲近代早期的君主制与东方中古社会的君主制存在显著区别，为了突出两者的不同，便将东方社会称为“专制主义”（德文：*despotismus*；英文：*despotism*）或“东方专制主义”，对于西方的绝对君主制，只是有时用专制主义来形容。有鉴于此，刘先生主张以绝对主义指称欧洲近代早期的君主制，以专制主义指称东方以及中国中古社会的君主制。笔者认为，欧洲近代早期的君主政体与中国中古社会的君主政体存在差异，做这样的区分十分必要，因而非常赞同刘先生的意见。问题在于欧洲近代早期的君主制是否达到了“绝对”的程度。在汉语中，“绝对”包含以下几种意思：①无任何条件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如绝对真理、绝对服从；②只以某一条件为根据而不及其他，如绝对值、绝对温度、绝对高度等；③完全、一定之意，如绝对正确、绝对没错；④最、极等意。在笔者看来，欧洲近代早期的王权较中世纪或等级君主制虽有加强，却很难说达到了绝对的程度，即可能没有达到汉语中这

些意思的任何一种，这应该是历史的实际。其次，在汉语中，绝对与专制在程度上似乎没有多少差别，因此不足以表达欧洲近代早期君主制的实际，也不足以说明与东方乃至中国中古君主制的差异。我们应根据历史实际而不是英汉词典翻译 absolute monarchy，也即说，现代英汉词典是否把 absolute 的原意确切地翻译过来尚存疑问。不过，这里只是将问题提出来，至于是否需要或以一个什么词汇取代“绝对主义”，以及应该怎样翻译，有待进一步研究方能解决。

祝贺作者书稿出版，更期待她的新著问世。

顾奎斋

2015年6月

山东大学五宿舍

目 录

序.....	1
导 言.....	1
第一章 伊丽莎白崇拜与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君主的公共形象	37
第一节 圣女王	38
——伊丽莎白崇拜	
第二节 腐败与萎靡	52
——詹姆士及其宫廷的公共形象	
第三节 暴君与暴政	60
——查理及其宫廷的公共形象	
第二章 新教政治传统与非宗教原则的君主统治	73
第一节 新教民族认同与新教政治传统	74
——伊丽莎白新教女神形象的塑造与构建	
第二节 宗教宽容与大众强烈的反天主教情感	85
——詹姆士的宗教宽容策略与影响	
第三节 天主教倾向与反天主教狂潮.....	118
——查理的亲天主教倾向及其政治影响	

第三章 新教国际主义与和平外交策略	139
第一节 末世论与新教国际主义	140
第二节 和平理想及其实践	163
——詹姆士王朝利益至上的外交策略	
第三节 和平外交遭遇谴责	172
——帕拉丁危机与强烈的反和平外交情绪	
第四节 欧战失利及其后果	180
——查理外交失误与议会内外激烈的抨击	
第四章 公民人文主义与宠臣政治	199
第一节 绝对主义理论	200
——无条件政治忠诚论和神授王权观念	
第二节 公民人文主义与对抗性公民意识	217
——建议权论的演变	
第三节 宠臣政治与攻击宠臣	232
——宠臣成为君主专制统治的替罪羊	
第五章 乡绅的地方认同与对抗专制统治	255
第一节 乡绅与乡绅文化	256
——乡绅的文化认同	
第二节 家世意识与地方认同	264
——家族史编纂的热情	
第三节 公共服务意识与地方责任感	287
——公共价值观念流行	
第四节 地方主义与对抗君主统治	311
——地方认同促使对抗集权政府及其政策	
参考文献	323

一、英国革命成因研究述评

英国的历史一直被公认具有全球意义，主要是其现代议会政治发祥地、工业化之母的地位。17世纪的英国，一贯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因为没有哪个时期能比17世纪发生的事件对英国历史的发展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英国革命作为17世纪英国史的最主要特征，其爆发原因成为该时期政治史的主宰^①，梳理英国革命成因的史学演变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

英国革命成因问题是英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从以克拉伦敦伯爵为首的保王党史学到以休谟为首的托利派史学，以及以马考莱、伽狄纳为首的辉格派史学，从20世纪的社会经济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再到20世纪70年代的修正派史学，历史学的质疑特质在英国内战成因的史

^① Michael Braddick, "State Formation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Early Modern England", *History Compass*, 2 (2004), p. 4.

学演变中得到充分体现。^① 由于历史观、历史思维和立场不同，解说历史和建构历史的方法各异，因而各代历史学家建构的英国革命成因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图景，英国革命的成因问题也就成了“现在和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一场对话”^②。历史学家作为社会的个体，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著名历史学家 E. H. 卡尔曾说：

在研究历史之前，首先应该研究历史学家本人……而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则要研究历史学家所处的历史与社会背景。^③

因此，对历史学家及其代表的史学流派进行研究，成为英国革命成因研究所无法回避的课题。

英国革命成因史学同英国革命的历史几乎一样久远，在王党军队和议会军队激战正酣之时，关于内战缘何而起的战争也拉开了序幕。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史学争论呈现阶段性跳跃发展的态势。纵观革命成因的史学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17 世纪

就在内战的硝烟尚未在英伦三岛上空散尽之际，英国社会各界便开始了战争究竟缘何而起的探索，此时的英国不仅出现了军事上的对立两派，而且还出现了对立的史学。^④ 战争也不再单纯是双方军事力量上的较量，还包括双方历史学家的口诛笔伐。

内战就其本质而言，具有明显的分裂性，它把战时的英国分为王党派、议会派和中立派；战后的英国又被分为胜者和败者。由于内战给当时英国人中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和结果，因此，历史学家在内战的成因上不可

① 刘淑青：《论英国革命成因研究的史学演变》，《史学月刊》2006 年第 5 期。

②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Harmondsworth, 1964, p. 23.

③ Ibid., p. 44.

④ R. C. Richardson, *The Debate o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Revisit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 21.

能达成共识。内战起因应追溯到哪里？人性本恶是西方传统的思想观点，因而有人把内战归于人类的贪婪本性，有人把内战看作是上帝拯救清教徒、议会派而对英国进行的报复，也有人不再从纯政治学的角度去解释内战的起因，而是对内战进行哲学反思。

研究英国革命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主要有克拉伦敦、霍布斯和哈林顿。这些历史学家或亲赴战场，或见证战争，掌握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内战中议会党人和保王党人都网罗人才到自己的麾下，历史学家遂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他们竭尽所能地搜罗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料，如小册子、宣言、议会演讲稿、报刊资料、私人手稿等从事历史研究，以此讨伐敌对派别，推卸内战责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历史研究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极大限制了关于内战成因研究的学术价值，加之政治倾向和政治立场不同，战争经历各异，这就使他们难以冷静、超然地看待内战本身。这就决定了第一代历史学家的研究既有后世历史学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同时又留下不可避免的缺憾。

（二）18 到 19 世纪

在这个时期，历史研究成为政党党同伐异的工具，关于英国革命成因的史学著述带有明显的政党斗争的功利色彩。

英国两党激烈的政治斗争，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史学领域。历史学家大多从政党利益出发，“披戴政党的徽章”^①进行历史著述。政治和历史之间的强大联系，导致历史研究不能在客观、冷静的学术气氛中进行。政党的激烈斗争促成了历史研究和政治斗争的结合，英国内战的研究成为 18 世纪学者手中的利器，而无法成为纯粹的学术争论。历史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为现实服务的倾向，辉格党和托利党关于英国革命的解释成为 18 世纪政治和宗教斗争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18、19 世纪，在英国内战成因问题上颇有建树的历史学家主要有休

^① H. T. Dickinson, *Liberty and Prope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London, 1977.

漠、伽狄纳和马考莱。尽管休漠声称自己超然于政党斗争之上，是一位政治中立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但实际上，他基本上站在托利党的立场上进行历史写作的，他的关于英国内战的观点在史学界长期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在18世纪中后期和19世纪初期，不少辉格党历史学家对托利党关于英国内战的观点进行猛烈的攻击，但是他们仍然难以取代休漠在内战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和声望。

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中期马考莱出现时才得到改变，马考莱取代休漠，成为英国一流的历史学家。马考莱在历史研究中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出色的历史写作风格，他“决心写出一部在几天之内取代小姐们床头上最时尚小说的作品”^①，因此，他的著作气势磅礴、辞藻华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其次，马考莱在史学研究中的成就也归功于自19世纪30年代起的政治气候，辉格党政治上的巨大胜利，英国人沉浸在自信、乐观的氛围中，因此，马考莱关于宪政自由的观点得到当时大多数英国人的共鸣和认同。

伽狄纳生活在英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黄金时代——维多利亚时代，他既是格拉斯顿主义的狂热崇拜者，又是克伦威尔的后裔，这对其研究不能不产生影响。维多利亚辉煌的经济和政治成就铸就了伽狄纳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盛赞英吉利民族的自由精神：

就政治制度而言，英国走在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前头……就像哥伦布进入新大陆，在这里没有什么向导和先例，只有勇气和智慧。^②

他在英国内战问题上的看法仍然没有跳出辉格党的模式，他把17世纪的英国史看作是英吉利民族争取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历史，“17世纪英国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在迈向维多利亚宪政”^③，他认为查理政权垮台的

① Jane Millgate, *Macaulay*, London, 1973, p. 119.

② Samuel Rawson Gardiner,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I to the Outbreak of the Civil War, 1603-42*, II, Nabu Press, 2010, p. 197.

③ P. Kenyon, *The History Men: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England since the Renaissance*,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3, p. 214.

真正原因是试图阻止英吉利民族自由意志的发展，而英国人民不愿像驯服的羔羊那样把自己置于专制君主的奴役下，这样内战就成为不可避免。

同克拉伦敦关于英国内战并非必然的观念相反，辉格派史学家秉持国王和议会之间冲突必然走向内战的观点。辉格派史学家倾向于用 17 世纪的历史来解释维多利亚宪政的起源，他们认为，内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詹姆士和查理的统治行为违背了英国古老的宪政，议会为维护宪政传统同国王专制统治进行了斗争。在辉格派史学家的这种宪政解释体系中，内战被看作是自由原则的初步胜利，是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辉格派进行改革运动的前奏。他们过分夸大了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

（三）20 世纪

进入 20 世纪，大英帝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维多利亚时代的富足和自信消失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影响日益增加，马考莱、伽狄纳等辉格派史学家关于英国革命的观点受到质疑。

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不再把目光集中在宪政等思想因素上。他们认为，内战爆发的关键因素是物质性动机和社会因素，内战是上升的资产阶级和衰落的封建阶级之间的冲突结果，他们开始到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寻找变革的根源。较有影响的是社会经济史学家托尼、社会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希尔。

托尼主张采用社会经济学的方法探寻内战的根源。鉴于“16、17 世纪的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①，他主张从这时期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动中探询内战的根源。

希尔针对 20 世纪历史学家片面强调内战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否定甚至贬低宗教根源的做法，认为只强调物质冲突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无法解释人们进行革命的动因。他说：

^① R. C. Richardson, *The Debate o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Revisit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 135.

抛弃清教革命模式，仅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英国内战的事件……
但这有时无法解释人的动机。^①

因此，他注重研究革命的社会思想根源，揭示思想氛围和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希尔认为清教同科学的功利主义一同，得到一些乡绅和中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为革命准备了思想基础。他说：“没有这些思想方面的成就，英国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②

在希尔看来，英国革命实际上是两种对立的思想意识斗争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修正派思潮兴起，他们对以往的传统观点进行全面否定，其代表人物有拉塞尔、莫里尔、弗莱彻、夏普、阿什顿等人。在英国革命的成因问题上，他们斥责辉格派历史学家的宪政解释犯了目的论的错误，同时又抨击马克思历史学家的社会经济解释犯了机械决定论错误。^③在研究方法上，他们抛弃过去宪政史的研究模式和框架，贬斥用国王和议会的冲突作为研究革命成因的突破口的思维模式。他们认为17世纪初的重要政治决策来自于宫廷，议会并不具备同国王争夺主权的能力，因而他们把研究的视线转向宫廷内部的斗争、政府结构和职能，以及外部战争对英国政治形势造成的冲击和影响等方面，据此解释内战的根源。修正派史学家否定内战不可避免的观点，否认内战的成因在于长期的社会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否认对立阶级的存在。在修正派史学家看来，在苏格兰战争爆发前，共识政治流行，英国没有出现要爆发内战的迹象。对于上层政治斗争，他们则用宫廷内部斗争和政府结构的缺陷以及对外战争来解释，他们认为英国内战的爆发是短期的、偶然性因素导致的结果，主要是苏格兰战争使得查理的无议会政权在政治上和财政上难以维持下去，国王被迫召开议会，从而为政府反对派提供了发动内战的阵地。他们认为，实际上，如果没有苏格兰战争，英国内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在1639年战争前，查理政权具备抵制或至少是化解潜在

① C. 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 Edinburgh, 1961, p. 75.

② C. Hill,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xford, 1965, p. 6.

③ Conrad Russell (ed.),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Macmillan, 1973, p. 8.